

# 多实街的老榕

■金圣华

车行顺畅,经过了窝打老道玛丽诺书院一带,忽见街头杜鹃残,醒觉春天静静降临了,又悄悄撤退了,怎么尚未细赏春光好,就已到落英缤纷春阑时了?车子转入一条横街,忽然停下了,向外一望,前后都是车,进退无门,动弹不得,车子就稳稳卡在马路的中央。

这是何处?抬头看看,忽然瞥见一棵枝叶扶疏、气根丛生的老榕,昂然挺立在眼前。老榕的旁边有一块路牌,上书“多实街”几个大字。多实街?这又算是哪里?向来地理常识贫乏,东南西北不分,只知道这会儿要去九龙塘接李欧梵教授,然后一起去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举办的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文学与翻译讲座,那么,这条街就是前往九龙塘的岔路或快捷方式了。

堵车了,可能会迟到,那又如何?已经不当主持人了,不必一早到场去打点,想起当年的风风火火,乐得眼前的闲闲适适。望着老榕,十九年前筹办这个文学奖的时候,它应该早已在此落地生根了。那时候的榕树假如有缘跟我打个照面,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疲于奔命、心劳力拙的局中人。谁叫自己当年不知天高地厚答应去担当这个重任?在没有经费,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在兵少将寡,配套不足的状态下,要创设一个以全球大专院校在读生为目标的青年华文创作比赛,不但奖金数额最高,而且评判阵容最盛,千头万绪,茫

无方向,真是谈何容易?

且不说募款的经过,超过一百万的经费,要像托钵僧似的一家一户沿门去化缘,必须咬紧牙关,抛头露面,告诉自己这是公务,不是私事,就豁出去吧!所幸当年得到实业家刘尚俭先生一口应承,慨捐一半经费,才使文学奖得以顺利启动。邀约文学奖小说、散文、文学翻译三组共九位终审评判,更是一个个动人温馨的故事。当时心想,为了增添文学奖吸引力,终审评判必须邀请文坛译坛最负盛名的巨擘大家,每一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何去一一说服打动?翻译组比较容易对付,心目中拟邀的三位名家余光中、杨宪益、高克毅都是同行的前辈,余光中更是文学奖的活水源头,若非他的引介,不会认识刘尚俭。杨宪益伉俪曾经应邀来中大访问,这次邀约,大概不吝旧地重游。至于高克毅,更是时相往返的忘年交,对于我提出的要求,从来不会婉拒。那时可曾想到,高先生当年已届八九高龄,家居佛罗里达州的冬园,要他先费神批阅参赛作品,再与夫人长途跋涉,远渡重洋从美东到香港来参加颁奖典礼,可是一个多么艰辛劳碌的历程!二十年后的

今天,自己体力大不如前,才真正了解老人家当年的付出与投入!

杨老原本欣然答应出任评判,谁知1999年爱妻乃迭溘然长逝,因哀伤逾恒,最终不克来港参与颁奖典礼。小说组的三位评判,王蒙、白先勇、齐邦媛的邀约过程,各有精彩之处。王蒙是我在北京“孔乙己”和傅敏夫妇饭聚时恰巧碰到的。原本就要登门拜访邀约的名家,竟然出现在邻桌,自然喜出望外,赶忙上前道出来意,王蒙一听就说,“我很喜欢替你们(中文大学)打工”,足见他对文学奖的支持与关怀。齐邦媛原先早已拒绝担当任何文学奖的评判了,电话里的一席话最后把她打动了。为什么青年文学奖的评判都请上了年纪的?因为想让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在青春岁月的人生启端,有幸亲炙文坛译坛宗师的教诲,因而有所感悟,有所传承,使文坛不老,后继有人。白先勇是通过高克毅的介绍,慨然应允,拔刀相助的。事后才知道当时他刚动过心脏手术,却“奋不顾身”地从美国飞来香港参加大会。这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十多年来跟白先勇结下了难能可贵的“牡丹缘”!散文组的评判林文月是多年

知交,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有她助阵,办起事来往往事半功倍。散文组决审时,另一位评判余秋雨正好开始他的远途长征,仆仆风尘于欧洲文明古国,于是,午夜电传,千里追踪,终于把得奖名单确定下来。散文组的另一位评判是柯灵老人。柯老原是父亲旧友,他们都曾经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曾经为孤岛时期的电影事业作出贡献。他们那个时代,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经历了漫长的动荡人生,多年后柯老来到香港,相约老友会晤见面。那一天,在同一条街上,柯老站立在街的一端,父亲守候在街的另一端,在那没有手机的年代,两老足足各自苦等了半个钟头,而始终缘铿一面。1999年在上海趁参加会议之便,电央柯老出任散文组终审评判,柯老一口应承,能有这么一位世纪老人、文坛宿将参与盛事,岂不令人兴奋?谁知2000年6月柯老因病辞世,令人神伤!柯老去世前,曾经为文学奖题词:“刚刚逝去的世纪充满矛盾。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科学成就灿烂辉煌,文学成就明显失重。《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的创建,无疑是个好兆头,给华文文学

世界报导春来的第一燕。”柯老的这番话,意义深远,因此,第一届文学奖得奖作品由天地图书公司赞助出版时,我就选用了《春来第一燕》作为书名,此后文学奖每隔三年举办一次,迄今已到第六届,我们的作品集承受柯老的祝福,分别命名为《春燕再来时》《三闻燕语声》《燕自四方来》《五度燕归来》,以及将会出版的《春燕六重奏》。

当年的评判阵容,人称为“九大行星”,其灿烂夺目之处,确实极一时之盛;而当年的得奖人,如今不少已经成为崭露头角的作家。十九年倏忽而过,当年的名家,如柯灵、杨宪益、高克毅已先后作古,但是他们点燃的文学之炬,仍璀璨旺盛,薪火相传。今年参赛的得奖者,一如以往,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十九年前文学奖初创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呱呱坠地的婴儿,或牙牙学语的孩童,是甚么样的机缘让他们自幼努力不懈,勤习母语,用秀美的文字谱出华丽的乐章,因此如今得以欢聚香江,为大会增添光彩?是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字的瑰丽多姿,就如眼前有“不死树”之称的老榕,盘根错节,独木成林,见证着人生百态之短暂,也见证着华文文学之不朽!

车动了,前路已通,在多实街的中央,老榕树的面前,神思飞扬了多久?二十分钟?半个钟头?谁知道呢?快快去接在九龙塘伫立久候的李教授吧!

(上接第一版)答案或许就是对质朴而又纯真的自然的洞悉,足以启迪我们的心智,这让我们知晓我们终将归向何处……”

可以感受到,这些西方学者为陶渊明首次以较清晰面貌在西方学术界亮相而感到兴奋。

随着《陶渊明的幽灵》英译本的面世,陶渊明在西方的精神盟友正在慢慢增多。今年6月9日,鲁枢元到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遇见了特丽·威廉姆斯与布鲁克·威廉姆斯夫妇,他们都是美国生态文化界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学者。其中特丽的《荒野的慰藉》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曾被程虹教授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读书界拥有诸多“粉丝”。他们在会上相谈甚欢,鲁枢元甚至还给布鲁克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鲁布柯”——“大地布满青枝绿叶”!布鲁克欣然接受,笑称鲁枢元为“brother”(兄弟)。让鲁枢元意外的是,特丽女士说,最近两个月里,他的这本关于陶渊明的英译本竟然成了布鲁克的“精神寄托”。他们夫妇在此次中国之行中,将这本书厚厚的复印件随身携带,几乎每一页都用绿色的便条写下阅读所感。

这样的相逢让鲁枢元很感动:“我们的陶渊明终于在当代西方遇到了知音。”

## “最佳范本”: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诠释中国文学

《陶渊明的幽灵》从中文书稿出版到“走出去”的过程,总共不到五年,这在中国当代学术专著的外译中并不多见。之所以能迅捷而顺利地译介成英文出版,也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教授的极力推荐与促成成分不开。

鲁枢元虽然长期在大学教书,但他自认更像一个“民间学者”,最初他并没有奢望将《陶》书翻译出版、推向世界,“因为这绝非个人的能力所及。”令鲁枢元十分感

动的是,《陶渊明的幽灵》出版后,他在第一时间收到乐黛云老师的电子函件,她说:“十分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追求的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诠释中国文学的最佳范本!”

乐老师不但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还在第一时间向有关出版社加以推荐。那时,这本书还没有获得鲁迅文学奖,国内的评论还不多。是外研社领导的坚持,这本书被纳入“中华学术文库”(乐黛云是编



布鲁克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展示他阅读的《陶渊明的幽灵》英译稿复印件

委之一)才得以最终出版。

“我很感激乐黛云老师,我和她其实并无深交,好像只是在某次会议上远远地见过一面。”鲁枢元说:“今年5月22日,也是我刚刚拿到英译本样书之后,乐老师便发来邮件说:《陶渊明》英文版新书面世,枢元,太为你高兴……我摔断了腿,情况危殆。’这是她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跌伤,我曾提出到北京看望她,被她谢绝了。然而,6月6日,在她伤势稍稍稳定后又给我发来短信,称英译版新书的面世是‘开创性事件’。学术乃天下公器,鲁枢元不过一区区常人,在乐黛云老师的胸怀里惦记的是‘天下学术’!”

“外研社‘中华学术文库’丛书目前已出版了近三十本。从已出的书目来看,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当代学术著作所占比例还很少。鲁枢元认为这套丛书可谓应运而生、适逢其时。“在人类社会进入生态学时代之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中素朴

的现象学思想、先天的整体论与生成论思想、和谐的自然美学、自发的生态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人们再也无法拒绝的学术资源和精神能源。与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总是‘顺水西漂’不同,在新的世纪里,它将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这也将是中国学术走向自主自立的开始,将是中国学术精神世界化的开始。”

## 文化摆渡:英译本自身就是一部跨文化的批评

在该书英译本的出版过程中,翻译自然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实际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潮中,有关翻译的讨论一直是焦点话题——请谁来翻译最有利于译介效果?原著在翻译过程中的删改是否合理或必要?具体字句的对应外文选择以及原文忠实度究竟该遵循哪些原则?等等等等,这些争议性的话题和技术节点,在《陶渊明的幽灵》英译过程中,都经过了作者与译者的审慎考量和细致打磨。

不同的作者对著作英译有不同的要求。有些作家或学者希望译者能原汁原味原样不变地呈现原著的面貌和风格。而鲁枢元对自己这部学术代表作的翻译却表现得比较放松,更考虑到中西方读者在接受时可能产生的阅读视角和知识储备的差异。在把书稿给译者时,出版社并未提出修改要求,鲁枢元自己先主动做了一道删文处理,中文原书二十四万字,被他删成十八万字。删去的部分有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陶渊明阐释的一些纠葛,还有一些是对于西方哲学的常识性解说,考虑到这些内容对于西方专业读者来说并不必要,所以删去。至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一些重要的哲理,比如《老子·第二十八章》关于“知白守黑”的阐述、《庄子·达生篇》中“返气相天”的观念,尽管意蕴深奥,难以翻译,但事关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对外介绍,

他还是刻意保留了。

“翻译,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对此我完全是一个外行。我当然期待译著能够大抵清楚地表达我的初衷,能够得到英语读书界的认可。但我也深深知道翻译一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再创造。而阅读,其实又是一次再创造,一个持续的接受与阐释的过程。一定要求原汁原味是没有道理的。”鲁枢元说。

该书的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一般而言,“汉译英”要比“英译汉”困难许多,学术专著尤其甚,所以,光是寻找译者就花了不少时间。经过几番筛选,最后苏州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主任孟祥春博士承担了此书的翻译重任。孟祥春历时两年,终于完成这项“艰辛而又满足”的翻译工作。实际上,该书的英译本自身就是一部跨文化的批评,它首先是原作者的跨文化批评,其次还是译者的跨文化批评。鲁枢元在书里引用了西方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的汉语译著有六十六部,引用的片段有一两百条。既然要译回英文,孟祥春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找到这些西方作品汉译本片段所对应的英文原文以及详细准确的出版信息。仅这项工作就进行了六七个月,所幸他当时人在加拿大,查阅外文资料可谓便利,否则几乎不可能顺利完成。翻译过程中,孟祥春一方面尽力保留很多中国古典概念的“中国性”,另一方面还需要从西方的视角来审视,用改造过的西方概念或范畴来再现中国的古典概念与范畴。光是建立“对应”的英文词汇和表达,就很不容易。在英译稿定稿之前,孟祥春还采用了目前国际学术著作翻译中比较通行的做法,即邀请一位很有经验的英国审校者审校译稿,以去除他的英译中可能存在的不自然的英文表达。如此的反复打磨,最终成就了这部高质量的英文译著。

鲁枢元非常感谢孟祥春的翻译,称赞孟祥春是“可以信赖的文化摆渡人”。